

爱国主义教育文库·历史

莘莘学子 赤心报国

——近代海外学子报国谱



武汉大学出版社

D647

30

02880

爱国主义教育文库·历史

总主编 朱雷 王承仁

莘莘学子 赤心报国

——近代海外学子报国谱

陈宁生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莘莘学子 赤心报国:近代海外学子报国谱/陈宁生
主编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3

(爱国主义教育文库·历史/朱雷,王承仁主编)

ISBN 7-307-01889-6

I 莘…

I ①陈… ②宋…

II ①留学生—先进事迹—中国

②爱国主义教育—中国

IV D 647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京山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4年3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2次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

字数:194千字 印数:3001—6000

ISBN 7-307-01889-6/K·169 定价:7.80元

目 录

- 一 革命旗帜 民族栋梁..... (1)
- (一)留学大潮与职业革命家..... (1)
- (二)革命先驱者的足迹..... (14)
- (三)民族解放事业的中坚..... (36)
- 二 铁马金戈战九州 以身许国浩气存..... (53)
- (一)投笔从戎誓报国..... (53)
- (二)一腔热血洒疆场..... (53)
- (三)军事探索指明路..... (83)
- (四)呕心沥血育将才..... (94)
- 三 近代工业的奠基人..... (107)
- (一)倾心实业 报效祖国..... (108)
- (二)救亡与启蒙的先锋..... (117)
- (三)救亡图存 拆厂内迁..... (135)
- (四)奔向光明 振兴中华..... (140)
- 四 科学无国界 科学家有祖国..... (147)
- (一)殷殷求学志 拳拳报国心..... (148)
- (二)倡科学救国 立强国根基..... (159)

(三)奋力拼搏 为国争光·····	(173)
(四)科学无国界 科学家有祖国·····	(186)
五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199)
(一)燃起爱国主义的火炬·····	(199)
(二)吹救亡号角 激时代风雷·····	(207)
(三)横眉冷对千夫指·····	(220)
(四)我以我血荐轩辕·····	(233)
六 磨血树人 培育英才·····	(244)
(一)废旧立新 锐意改革·····	(245)
(二)孜孜求学 谆谆施教·····	(267)
(三)育人为了救国 救国不忘育人·····	(281)
(四)艰难的探索 有益的奉献·····	(298)
结束语·····	(314)
后 记·····	(316)

— 革命旗帜 民族栋梁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出现过一支近 10 万人的留学生群体。这一群体的崛起，是封建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沉沦过程中在救亡意识激荡下的产物，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形嬗变过程中新兴力量兴起的标志。他们处于古今中西的聚焦点上，直接领略了欧风美雨的洗礼，肩负着西学东渐的历史重任，成为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先导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力源。在我国近代留学生群体中，虽产生过一些官僚政客、军阀民贼、洋奴汉奸，但更涌现出一大批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和革命者，其中不乏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雄视百代的学术巨子和功绩卓著的爱国实业家，更多的则是在各个领域中为祖国的繁荣昌盛默默奉献的耕耘者。本篇着重记述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曾在海外留学的职业革命家献身祖国革命的英雄业绩。

（一）留学大潮与职业革命家

从涓涓细流到汹涌大潮 1846 年冬，香港一所

教会学校的美籍校长因回国休假，愿为三五名中国学生提供两年的留学经费和父母的赡养费而使其赴美留学，但学堂里 40 多名中国学生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因当时中国的国门刚被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国人对海外世界茫然而又恐惧，况且，有钱人家的子弟莫不以科举为正途，至于出国留学，尚属史无前例，是祸是福，难以预料。最后，仅有 3 名出身贫寒又不乏冒险精神的学生悄然起立，其中之一就是 1854 年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西学东渐记》的作者容闳。

作为孤独的先行者，容闳等人开中国近代留学史之先河。也正是在他的竭力倡导下，促成了第一批官派留学。自此，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历经了甲午中日战争前的留美、留欧；甲午中日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的以留日为主；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前后的各国并重三个时期。

比较全面地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容闳，1855 年归国后力主“由政府选派颖秀青年出洋学习”，认为这是“改造中国的最重要计划”。他结识了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等洋务派首领，便进言实施留学教育计划，遂有官费派遣留学之举。1872 年至 1875 年，清政府每年选送 30 名 12 岁左右的幼童赴美留学，4 批计 120 名，委派陈兰彬、容闳任“幼童肄业局”正副监督，负责管理事务。原定幼童留美期限为 15 年，

由于清政府认同守旧顽固势力的所谓幼童“适夷忘本”，“离经叛道”谬论，于1881年将全部学生中途撤回，未能按预定计划完成学业。与此同时，在沈葆楨、李鸿章、吴赞成等的主持下，从1875年起，先后4批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和海军官兵，共计97人到英、法、德等国学习船政、兵技、矿冶等学。总计这一时期共派近220名学生出国学习。1886年，清政府由于派员出国学习，“经费太巨，财力不逮”，以及顽固派的反对，而停止了派员出国学习的工作，一直中断了近10年。

甲午战争后，特别戊戌变法失败后，由于日本学习西方而日臻富强，因而向日本学习便成为时代风尚，因而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留学日本的高潮。1896年，清驻日公使带13名学生赴日，中国近代留日运动由此开端。尔后，清政府不但开始成批地往日本派遣留学生，还令各省选派学生赴日，并成为一种固定的政策，许多自费者也纷纷前往，留日学生与年俱增。据日本学者统计，1901年为280人，1905年最多，为8000人，1908年4000人，总计1901—1908年到日本留学的为37850人，留学欧美的学生则不多。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留学的风向发生了转变，由云集日本向欧、美转向，形成各国并重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日本政府对留学生的革命活动进

行限制和迫害所致，同时也与美国和欧洲列强对华政策的转变有很大关系。本世纪初，美国为加强对中国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以取回收获”，舍近利而图远功，实行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1908年，美国国会决定将该国所分“庚子赔款”（美国分得“庚款”的7%）的一部分退还中国，用于每年派百名中国学生留美。1911年，我国专门成立了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其后，清华连年派送学生留美，至1924年累计达869人，另有私费留美学生千余名。

赴法勤工俭学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勤工俭学起源于民国元年，盛行于“五·四”时期。这时，一些留法前辈号召青年去法国“勤于作工，俭于求学”，并专门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动员组织。这样，从1919年3月第一批学生赴法，到1921年11月104名勤工俭学学生被法国政府强行遣返归国，前后约两年零8个月，先后有1700余名青年赴法半工半读。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由发端于19世纪40年代末期的一股涓涓细流，经过半个世纪的时光已汇成汹涌大潮。

从师夷救亡到探求真理 近代中国留学运动由小到大，形成热潮，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动因。

在清道光朝之前，国人本着鄙视蛮夷的祖训，视洋人一钱不值，且作为“天朝上国”，中国千余年来

一直是接受留学生的国家，日本、安南、新罗、百济等周围小国无不争遣子弟来入太学，自然不会派人留学“四夷”。到了19世纪初，西方世界风驰电掣，一日千里，已稳固地建立起称雄世界的资本主义文明，而东方巨狮却在埋头酣睡，自诩文化优长，人力无量而固步自封，闭关自守。农业的中国面对以近代工业为基础的世界列强，犹如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面对年轻力壮的强盗，结果是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西方的大炮惊醒了中国部分先进分子，他们发现这欺侮自己的“番鬼”身强技熟，船坚炮利，于是觉得再不能象以往那样将西方的先进技术目为“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应运而生。但此时的清政府仍未被大炮惊醒，“师夷”仍未举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鉴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抵御外侮的需要，主张学习西方长技，然而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仅限于坚船利炮，故该时期派遣留学的指导思想是以“军备”为主，培养军事人才是唯一目的。派遣幼童赴美，学习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无一不是与用兵相表里”的科目，只是为军事服务的工具；派遣学生去英法学习造船驾驶，派武弁到德国学习陆军更是如此，因为在当时的统治者眼里，英法德是军事上最强的国家。

中国派遣学生留学西洋仅比日本稍晚，近代化

几乎同时起步，然而日本派遣的留学人员却不是主要学军事，而是学习发展国民经济的技艺，考察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在危机意识下急起直追，仿效西方，通过“维新”迅速崛起。在不到 30 年的时间内，日本国力大增，并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一举战胜了老大的清朝帝国。可见，对中国来说，两次鸦片战争是使中国在昏睡中初醒，甲午战争却是中国开始苏醒的状态下受人猛击！前者是素不相识的西洋列强所为，后者却是往昔向己称臣的东洋弟子，这不能不令中国人愤羨交加，愤其恩将仇报，羨其一跃而强。同是学习西方文化，为何成败殊途？于是朝野上下，同感通过学习日本学习西洋文化是中国的最佳出路。这是甲午战后中国留学生群趋日本之动因。同时，在甲午海战中，由西洋铁甲战舰组成、英德专家训练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的事实，使更多先进的中国人产生了仅学西洋的“坚甲利兵”足以强国的理论是不够的。环顾四邻，日本通过仿效西方跻身列强，俄国学习西方而成一方霸主，小小泰国重视西文西学，各国对其亦礼敬有加。这一切都使热血青年看到认真学习西学、西艺、西政的重要。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通过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之役后，虽然也认识到俄日泰之强在于“变法”，变法的人才要靠留学来培养，决定派大批人员到日本学习，但仍以习军事、技艺为主，以满

足其“新政”的需要。加之中日两国，文化上有着血缘关系，文字语言障碍较少，且仅一水之隔，省时省费。这样，便形成20世纪初的留日高潮。公费、私费留学人员大批涌入日本。大批留学生到日本后，鉴于国家日趋贫弱，民族危机的严重，纷纷走上爱国革命的战场，遭到日本政府的迫害，而这时美国又以部分庚款作为赴美留学之用；同时在蔡元培等一批留欧前辈的倡导下，留法勤工俭学一时成为风尚，因而留学方向又由独衷日本，转向欧、美、日并重，且有日益侧重欧美之趋势。

为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并顺其“长技”之藤，摸到了“西政”和“民主科学”之瓜。但这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困境，效法日本的“戊戌维新”百日即告流产，辛亥革命虽推翻了帝制；但民主共和的希望转瞬就被袁世凯所践踏。理想一次次的破灭，使人们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怀疑，血的事实教育人们必须重新探求救国救民真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把探求真理的目光转向俄国，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和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经验，而更多的人仍继续到欧、美、日学习，摸索强国救民之路。

从“种豆得瓜”到造就掘墓人 留学运动，犹如一艘驶向彼岸世界的航船，离开窒息思想的故国，到异域寻求救国救民真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

开这条航船缆绳的，却是清政府。他们在时代潮流冲击下派遣留学生，为的是使其“学成返国，用济时艰”，成为支撑封建大厦的卫道士，但事与愿违，在几代留学生中涌现出从容闳、严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大批革命党人乃至后来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的反动统治者用自己的双手，造就了一大批旧制度的掘墓人。

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闳，1855年归国后，其志趣全在于寻求发展近代教育以谋求祖国富强，但在守旧的环境中，他历经磨难，仅派青年出国留学一事，先是“十年不得一试”，后又中途夭折。但他始终与时代潮流并进，用自己的才智与影响来推动中国近代化的车轮。1896年他曾游说清政府设立国家银行，又拟议建筑津浦铁路，均未果。1898年参与维新运动，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主持的张园会议，即“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最终被清政府通缉而移居美国。他是在亲眼看见民主共和国成立3个月后才离开人间的。之前，1910年他还曾邀请孙中山赴美商谈，表示支持革命。近代中国留学的开拓者同时成为旧制度的第一个叛逆者。无独有偶，1877年被福建船政局派往英国学习海军技术的严复，在国外竟钻研起达尔文、斯宾塞的著作，潜心考察西方的司法和社会政治制度，归国后成为著名的维新志士、传播西学的大师，中国近代卓越的

启蒙思想家和封建专制的叛逆者。种豆得瓜，其实难怪。正是由于留学生较多地接受了西方先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他们必然或多或少地会突破封建传统的束缚。诚如容闳所说，留学生一旦出洋，“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

在日本留学生中，不仅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第一批璀璨的群星，鲁迅、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成仿吾、李叔同，更诞生了邹容、陈天华那样慷慨悲歌的革命政论家，吴稚晖、秋瑾那样的行动者和一大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杰出战士。黄兴、蔡锷、程潜、李烈钧、宋教仁、廖仲恺、何香凝、朱执信、于右任、邵力子、章士钊、胡汉民、黄炎培、沈均儒，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无不在日本留下足迹。辛亥革命时期，所谓的“革命党”，其中大半为留日学生。在有传可考的 328 名革命党人中，留日出生者有 285 人；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临时参议院的 43 名参议员，留日出生者占大半；首届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 18 人中，留学生出身者占 15 人，其中留日的 9 人。清政府为避免派往日本的军事留学生参与革命，尽量从世家宦族子弟中遴选，并专设海陆军留日学生监督处严加管束。尽管如此，军事留学生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成为清廷的异

己力量。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仅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加入者不下百人。他们回国后，由于新军人才奇缺，大都受到重用，因而在辛亥首义后，多成为各省光复的中坚人物，如参加云南起义的40名陆军干部中有30人是留日学生。武昌起义后，几乎各省的兵权都由留日士官生掌握。如江西的李烈钧、云南的蔡锷、福建的许崇智、上海的陈其美、山西的阎锡山等。总之，留日学生在民国初期的政坛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在稍后的留日学生中，亦涌现出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和骨干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泽民、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周恩来、彭湃、周逸群、张闻天、邓子恢、杨鲍安、杨闇公、宣侠父、于树德、廖承志等。留日热潮已完全突破了留学的既定目标，腾空而起的是一排排以血肉凝成的轰炸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炮弹。日本，堪称是中国旧民主革命不沉的“航空母舰”。

大批革命家在留学生中孕育诞生，有着特定的气候与温床。首先是民族危亡与海外受辱的双重感奋。甲午战败后的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豆剖、鲸吞蚕食之危，想通过变法自救图强，维新运动又一败涂地。出路在哪里？大批有志之士正是在此痛苦迷惘之际，为寻求富国强兵之策而浮槎东渡，忍辱卧

薪。但此时的日本，已被空前的民族沙文主义所刺激。战前，日人对我华侨无不礼让三分，战后便翻然改态，对我留日学生极尽歧视欺侮之能事。中国学生购物，便要加价；私立学校对中国留学生的教育多以赢利为目的；稍为重要的课，就要中国留学生退堂；日本学生认为弱国的人只能是低能儿，中国学生考60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日本人对留学生甚至以“猪尾巴”、“豚尾奴”相称！一部近代中国留日史，既是留日学生充满辛酸血泪的忍辱负重史，又是留日学生逐步觉醒奋起的排日反日史。切齿国仇、域外遣恨的双重刺激成为孕育革命思想的温床。其次是特殊革命氛围的影响和熏陶。在清末留日群体中，除了新式学堂培养的大批知识分子，还有相当一部分“亡命客”——维新志士在变法失败后多赴日避难，孙中山为首的反清革命派也以日本为革命基地，且不少人有着留学生与亡命客的双重身份。在他们周围，吸引了一大批不满现状的留日青年。在这种特殊革命氛围的影响下，反清革命思想在留学生中潜滋暗长，使其爱国思想开始冲破封建思想的藩篱，而带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色彩。正如孙中山追溯当年情景时所说：“赴东求学之士，类多头脑新洁，志气不凡，对于革命理论，感受极速，转瞬成为风气，故其时东京留学界之思想言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东京也“遂以中国革

命渊藪闻”。由于留学生中间革命思想的澎湃发展，留学生的集中地自然就成了革命的堡垒和根据地。特别是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后，不仅留日学生成为主要骨干，留日学生此后的爱国活动更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组织的革命活动融为一体。再次，是反帝爱国斗争的教育和锻炼。留学运动中留日高潮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留日生与国内反帝爱国运动密切相关。适应反帝爱国斗争的需要，留日学生已开始建立自己的组织和团体，如1900年，一万多留学生在东京组织的“励志会”，1901年建立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并旋即卷入当时的政治斗争。因留日往返甚便，祖国一旦有事，留日生立作归计，事态平息又再度返日续学。当时留美学生“爱国不忘读书”，留日生则“读书不忘爱国”，历次国内反帝爱国斗争，都曾引发留日学生大规模集体归国。20世纪初，沙俄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妄图霸占我东三省，一场拒俄运动在国内勃然而起，留日学生纷纷集会，并派人回国请愿联络，成立拒俄义勇队，要求随军北行，踊跃之情往往使“举座皆泣，不能仰视。”清廷驻日公使诽谤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革命”，清廷则密饬各地将归国学生“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正是现实斗争的教育使一部分留学生从“保卫大清社稷”走向反清革命。在辛亥革命前的历次反清武装起义中，留日学生直接起到骨干作用，武昌起义爆